

曹学佺《蜀中广记》的成书及版本略考

严正道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南充 637009)

摘要:《蜀中广记》是明代曹学佺编撰的一部重要地方文献著作。它的初稿主要完成于曹学佺任职蜀中的四年间,后曹氏被罢职离蜀,旋又因丁忧返乡,最终在家乡完成了对初稿的修订、整理与重新抄录,至此《蜀中广记》才最后成书,时间大概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成书后,曹氏并未将全书付梓刻印,由于见不到全书的最后定稿,后来的收藏者则只能将曹氏或其他人单独刻印的各记组合拼凑起来,也就有了今人能看到的不完整的明刻本。而曹氏唯一的手抄定稿,乾隆间为扬州盐商马曰琯兄弟所得,后清廷修四库全书,由其子马裕将此本呈送,也就有了今人能看到的唯一的完整本四库本。

关键词:曹学佺;《蜀中广记》;成书时间;版本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3)05-0160-06

《蜀中广记》是明曹学佺编撰的长达一百零八卷的煌煌巨著,共十二记,其中《名胜记》三十卷、《边防记》十卷、《人物记》六卷、《宦游记》四卷、《郡县古今通释》四卷、《风俗记》四卷、《方物记》十二卷、《神仙记》十卷、《高僧记》十卷、《著作记》十卷、《诗话记》四卷、《画苑记》四卷,保存了大量珍贵文献,是研究古代巴蜀地区(包括今云南、贵州一部分地区)文学、历史、民族、宗教、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材料。由于其搜采宏富,包罗万象,故四库馆臣谓“谈蜀中掌故者,终以《全蜀艺文志》及是书为取材之渊藪”^{[1]卷七十,627};近代藏书家傅增湘先生更认为此书为“考蜀事者必备之书”^{[2]卷四,226},可见其文献之价值非同小可。然而这样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地方文献著作的成书过程及版本的流传情况,人们尚存在较大的争议,因此有必要考证清楚。

一 关于《蜀中广记》的成书

曹学佺,字能始,号石仓,侯官(今福建福州)人。

好山水,喜游历,早年在搜集各种舆地名胜资料时即开始留意蜀事,其《大明一统名胜志序》云:“予初得《太平寰宇记》抄本,为宋太平兴国间宜黄乐史所撰上者。又得建溪祝穆所编《方舆胜览》,盖麻沙书坊板也,常置在案头。……又得杨用修家所抄密阁东阳王象之《舆地纪胜》。象之兄为蜀漕,故于蜀事尤详。”^{[3]序,234-235}此时的曹学佺对蜀事印象深刻,尽管还没有产生编撰《蜀中广记》的想法,但这必然是诱发他人蜀后产生这种想法的重要原因。其后曹学佺闲职南京,为消除政治上的苦闷,在漫游各地名胜的同时,“沉观四库诸书,凡可为各省山川名胜资者悉标识其端,积有七篋”^{[3]234}。这其中就包括巴蜀的名胜资料,后来入蜀时这些资料被其“用二十夫之力舁以相随”^{[3]234},成为其编撰《蜀中广记》的重要资料来源,可以说南京时期是其编撰的准备时期。非常凑巧的是,随后曹学佺即被命为四川右参政,为他编撰《蜀中广记》提供了天时、地利之便,才最终产生了这部宏富巨

收稿日期:2012-10-21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曹学佺《蜀中广记》研究”(12YJCZH240)及四川省旅游发展研究中心“《蜀中名胜记》与四川旅游业的发展”(LY09-05)相关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严正道(1975—),男,江西吉安人,文学博士,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著。可见《蜀中广记》的产生既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又有一定的必然性。

曹学佺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接到任命，于次年(1609)“三月到三巴”^{[4]卷二十，《乙酉初度》}，至癸丑岁(1613)“以蜀宪放归”^{[5]《祭林氏妹文》，754}，在蜀中任职四年。《蜀中广记》的绝大部分初稿应该在这四年时间内得以完成。那么他是如何完成全书初稿的呢？首先，这得益于他知识的博涉多通与早期的材料积累。曹学佺自幼好学，长昼耿夜，陶然于书趣之中，无所不览，博涉而多通。出仕不久，其才名就在当时人文荟萃的南京传播，连一向自视甚高的李贽，也为其博学所倾倒，以“学道”称之。正是因为有这种深厚宽广的学识作基础，他才能在众多的文献材料中纵横捭阖，自由取舍，编撰出这部包罗万象的地方文献巨著。其次，这与曹学佺编撰时的勤奋、执着、不畏艰苦的精神相关。曹学佺一生肆力于学，笔耕不辍，著述盈篋，好友徐燊称其“丹铅黑槩，终日随身；绡帙缥囊，无时去手”^{[6]卷一，48}，可见其奋砺之情。与南京相比，蜀地职事繁杂，他在写给南京友人的信中曾说“南曹太闲，西蜀太忙”^{[5]《金陵诸友启》，89}，诗中又有“居官无暇日”^{[4]卷二十，《园内亭成四首之三》}之说。尽管如此，这并不影响他治学的态度与精神。政事之余，曹学佺潜心问学，搜集整理考订各种文献，“在官犹喜得抄书，每日偷工校鲁鱼。莫谓风流成罪过，此中原是子云居”^{[4]卷二十，《校书》}。治学著述，自得其乐。同时，四处考察，遍访蜀地，举凡山川形胜、文物古迹、风情民俗，无不亲历，作实地考察研究，为编撰《蜀中广记》积累第一手材料。正如曹孟善《曹石仓行述》所云：“蜀多名胜，公暇则与僚佐探搜洞壑，布置亭馆。”^{[5]附录，14}正是这种不知疲倦、锲而不舍之精神，经过四年的日积月累、厚积薄发，才修撰完成这部大型地方文献的初稿。故傅增湘先生谓：“《池北偶谈》载能始官四川时，与监司谒抚按，于馆中别设一几，隶人置书几上，对众一揖，即就几批阅，不交一言，时人议其孤抗。余意其时必正撰此书，征材隶事，万卷纷罗，宜其揣意笃志，冥心孤往，在簿书丛脞之际，而能成此钜编也。”^{[2]卷四，225}傅先生也是嗜学如命，故有此惺惺相惜之言，颇能体会曹氏当时编书之情景。

蜀地不但多奇山异水，更有着深厚的人文积淀，“剑阁、峨眉、锦江、玉垒，称古今狂客骚人、名流雅士之一大武库焉”^[7]。从初唐开始吸引文人的注意，历朝历代不知蕴育了多少奇文佳句。曹学佺亲历蜀中，有机会感受巴蜀奇山异水对文学的影响，并体验到巴

蜀文化的独特魅力。除了诗文创作外，他还通过修书这样一种方式来传递和表达自己对巴蜀独特地域风貌和文化的感受，因而有一种迫不及待地要与同趣好友分享的愿望，故曹学佺每修撰完成其中的一部分，便寄与远方好友雅趣共赏。如《名胜记》部分，寄与南京的好友林茂之，后来林茂之请钟惺作序刊刻于南京，使得《名胜记》独受文人赏爱，流传甚广，反复刊刻。又如《画苑记》、《诗话记》这两部分，徐燊在《红雨楼序跋》中云：“能始宦蜀中四年，初寄余《蜀草》，再寄余《峨眉记》，三寄余《蜀中诗话》，最后寄余《画苑》，凡于蜀中之佳事佳话，收拾殆尽矣。”^{[6]卷一，20}由于这些部分的相对独立性，后来在《蜀中广记》全书并未流传的情况下，爱好者只能通过其一窥全貌，也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明刻本。关于这一点，稍后有详细考证。

万历四十一年(1613)，曹学佺被削官三级获罪而归，也因此留给后人一个疑问，即《蜀中广记》最后完成定稿于什么时间。清代四库馆臣就曾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云：“学佺尝官四川右参政，迁按察使，是书盖成于其时。”^{[1]卷七十，627}他们认为《蜀中广记》可能在曹学佺还在蜀中的时候就已成书，但从他们的语气看似乎又不十分肯定。四库馆臣的说法大概是依曹学佺的好友钟惺而来。万历四十六年(1618)，林茂之将其中的《名胜记》刊刻于南京，请钟惺作序，他在序中言：“吾友曹能始，仕蜀颇久，所著有《蜀中广记》。问其目，为《通释》、为《方物》、为《著作》、为《仙释》、为《诗话》、为《画苑》、为《宦游》、为《边防》、为《名胜》诸种。”^[8]钟惺与曹学佺在南京相识，后曹学佺任职蜀中，两人有书信往来，如曹学佺《雪桂轩草》中有《寄答钟伯敬二首》就是明证，因此对其修撰《蜀中广记》应有所了解。那么钟惺所言是否准确？其实也未必。钟惺虽然知道曹学佺在编撰《蜀中广记》，但对于其具体的进展情况他也未必十分清楚。这从他后面的话中可以看出。钟惺先言“问其目”，意思是向曹学佺询问而得，可见他是没有见过全书的。接着，钟惺又在介绍《蜀中广记》各目时出错，不但少了《人物记》，还将《高僧记》、《神仙记》合为《仙释》一目，如果他见过全书就不可能出现这样明显的错误。根据以上两点基本可以断定钟惺并未亲眼目睹全书，他看到的仅是《名胜记》这一部分。钟惺作序时间离曹学佺出蜀有五年之久，此时尚且未见到全书，那么他的说法也就不一定可靠，故四库馆臣的疑虑是正确的。由钟惺序中所言我们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推论。钟惺作序是受林茂之所托，并由其最后刊

刻,为何钟惺序中所言出现如此明显的错误而林茂之照样刊刻呢?按林茂之与曹学佺为同乡兼诗友的关系,曹学佺入蜀前曾闲职江陵十年,期间与林茂之交往甚密,今《曹大理集·金陵集》中有大量诗歌记录了他们的游赏、酬唱,可见关系非同一般。曹学佺入蜀后,两人书信往来不断,曹学佺还曾力邀林茂之前来,其诗《寄林茂之》云:“与君期入蜀,珍重尺书回。只索诗篇寄,不同友朋来。”^[4]卷二十大概林茂之亦向往巴蜀山水,却因其他原因无法成行,故曹学佺修成《蜀中名胜记》后特寄之以相慰。曹学佺被贬出蜀,途经庐山,有终焉之想,初欲筑草堂卜居于此,后逢丁忧而未果。期间,林茂之前来相访,见其《雪桂轩草·喜林茂之至》。既然林茂之与曹学佺关系如此密切,那么他应该比钟惺更为清楚《蜀中广记》的编撰情况,特别是在曹学佺携带书稿出蜀暂居庐山的这段时间,林茂之前往相见,如果《蜀中广记》已最后定稿成书,那么曹学佺必定会以之相示。也就是说如果林茂之在庐山与曹学佺相会时看到了《蜀中广记》的最后定稿,他就会指出钟惺序中之错误而不会照样刊刻。依此推论,则林茂之是没有看过《蜀中广记》的成书定稿的,由此也可以证明《蜀中广记》并不成书于曹学佺任职于蜀中时。

这样看来,曹学佺在完成《蜀中广记》的大部分初稿后,因为突然被贬职,不得不将最后的收尾工作留待以后去完成,如对初稿的修订、进行统一的整理与编排、最后的抄录等等。那么这些工作最后完成于什么时候呢?目前也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其完成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之后,如今人刘知渐认为:“《蜀中名胜记》曾在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戊午单独出版。后来,曹学佺曾把有关四川的著作,集写成《蜀中广记》一百零八卷。”^[9]前言,5 第二种观点认为其最后完成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如今人刘孔伏在否认刘知渐观点的同时,认为:“将《蜀中广记》成书年代定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较为符合情理。”^[10]就第一种观点而言,它只是刘知渐先生个人的一种猜测,缺乏必然的依据,暂且不论其正确与否。至于第二种观点,则主要是依据钟惺《蜀中名胜记序》而来,只不过在理解上出现了偏误。刘孔伏先生据序认为“他于万历四十六年以前就见到了《蜀中广记》全书”,并进一步考察林茂之的行踪:“小传(笔者按:即《扬州画舫录》)说林氏是从家乡福清直接‘移江宁’,福清离侯官不远,他与在侯官闲居的曹学佺必然有一些交往,故‘好其书’。林氏移居南京时,曹学

佺将修改整理好的《蜀中广记》副本交给了他,并且嘱其到南京后找好友钟惺。到南京后,钟惺浏览了全书。”^[10]由此他推定《蜀中广记》成书于万历四十五年较合情理。如前所论,钟惺在序中表达的是想见全书而不可得的心情,恰恰是未见全书。另外从林茂之的行踪来看也不符合事实,林茂之在曹学佺任职江陵前就已移居南京,两人的相识也是在南京,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也找不到曹学佺万历年间闲居家乡时林氏曾拜访过,说林茂之受曹学佺嘱托将《蜀中广记》交给钟惺,这完全是不合理的推测,于现实及情理都不通。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刘孔伏先生的推论是错误的,《蜀中广记》也不可能成书于万历四十五年。

其实,《蜀中广记》的成书时间还是得从曹学佺的行踪及本人的材料中来确定。曹学佺罢职出蜀后在庐山有过一段时间的停留,后因丁忧返乡,直到天启三年(1623)才被重新启用,闲居了整整十年。没有了政事上的烦恼,曹学佺可以潜心学问,专于著述,“纂成《天下名胜志》,选《十二代诗》盛行于世,复殚力《五经》,撰著一家言”^[5]附录,14-15。《天下名胜志》、《十二代诗选》都是鸿篇巨制,卷秩浩繁,在规模上都超过了《蜀中广记》,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是很难做到的,从逻辑上讲这些著述也应当是在曹学佺完成《蜀中广记》之后才开始的,至少相差不远,如此他才能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转移过来。因此,《蜀中广记》的完成时间应当在这个时期内,并且比较靠前。那么会是哪一年呢?曹学佺《祭徐鸣卿文》云:“鸣卿每读余诗辄欲焚其笔研去。今岁观余《蜀中广记》,叹赏以为古今所未有之书。”^[5]713 曹学佺的这句话明确无误地告诉了我们《蜀中广记》已最后成书。又据明蔡献臣《清白堂稿》卷十二上有《挽徐鸣卿职方》诗,诗歌编年在甲寅年,即万历四十二(1614)年,这与曹学佺文中提到的在“苦块之中”、“余今年过四十矣”的说法相符合,故可知“今岁”为万历四十二年。曹学佺从庐山返乡丁忧,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把《蜀中广记》的后续工作完成,然后将精力转移到《天下名胜志》、《十二代诗选》等著述上来,从情理和逻辑上都非常合理,因此,把《蜀中广记》的最后定稿成书时间定在万历四十二年应该还是比较可靠的。

二 关于《蜀中广记》的版本

目前所见的《蜀中广记》版本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明刻本,一个是四库本。下面对这两个版本的主要特征与流传情况作简要论述。

(一)明刻本

严格说来,《蜀中广记》的明刻本并不是一个系统完整的版本,而是一个零散拼凑本。《蜀中广记》按类编排,分为十二记,这十二记之间相对独立,都可以单独成书,而明刻本就是由这样一些刊刻于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独立各记拼凑而成。以目前所见,各馆所藏的明刻本《蜀中广记》都不完整,如国家图书馆存九十一卷,浙江宁波天一阁文物保管所存五十四卷,北京大学图书馆存二十二卷。作为一部全书,无论它们内容残缺多少,但在形式上总是会体现出系统性与一致性的,而三馆所藏却不是如此。首先它们在体例与编排上是独立的,如在名称上不是使用统一的“蜀中广记”名称,而是以记命名,在分卷上同样如此,各记单独分卷。举例来说,四库全书《蜀中广记》的体例编排是先言蜀中广记卷多少,再言某某记第几,而上述图书馆所见明刻本都是蜀中某某记卷之几,各记相互独立。其次,明刻本各记在页面版式、刊刻字体等方面也并不一致,这一点傅增湘先生早已指出过:“通观十二记,其中义例不一,字体各殊,疑其撰成非一时,授梓非一地也。全书皆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然《名胜》、《人物》、《游宦》、《边防》皆方体字,余八记则以楷书上板。”^{[2]卷四,225}而最能说明这个明刻本是拼凑本的是它在两处出现了序:一处是《蜀中名胜记》处,即钟惺所序;一处是《蜀中诗话记》处,题为《蜀诗话画苑二录序》,由魏说受曹学佺嘱托而作。可见前者是林茂之所刻,后者是曹学佺自己所刻。根据以上的一些特点,基本可以断定这个明刻本不是《蜀中广记》最后的定稿,而是由不同人刊刻于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零散各记拼凑而成,最后被收藏者以《蜀中广记》名之而已。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拼凑本呢?大概是因为《蜀中广记》内容庞杂,卷帙浩繁,无法短时间内编撰完成,而又由于各记具有相对独立性,故曹学佺在编撰的同时,也将其中一些已经完成的部分付梓刊印,如《诗话记》、《画苑记》等。而另外一些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曹学佺自己没有刊印,但初稿却被好友或好事者得到,最后由他们刊印出来,如《蜀中名胜记》等。至于经过曹学佺最后修订和统一编排的完整的定稿,可能曹学佺并没有付梓刊印,故这个完整的《蜀中广记》定稿反而没有流传开去。而一些藏书爱好者由于无法得其全书,故将这些独立刻本汇集起来试图组成完整的《蜀中广记》,因而也就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拼凑本。拼凑本的最先收藏者,据傅增湘先生考证为如皋人李犹龙,“考《通州志》,犹龙字海岳,万历二十四年举人,构层楼十数楹,储书其上,自

中秘迄山野遗书墨迹,靡不毕致,叠案盈床,晨夕披阅,旁列姝丽,时闻丝竹声,亦明季淮海间一畸人也”^{[2]卷四,226}。李犹龙大约为曹学佺同时代人,因而他的收藏也是最全的,国家图书馆所藏即来源此。

在了解了明刻本的大致情况后,接下来简要介绍一下各馆收藏的具体情况。

1. 国家图书馆存九十一卷:《名胜记》三十卷、《郡县古今通释》四卷、《风俗记》四卷、《人物记》六卷、《方物记》一至十一卷、《著作记》十卷、《高僧记》十卷、《诗话记》四卷、《画苑记》四卷、《宦游记》四卷、《边防记》一至四卷。原为傅增湘收藏,后转归国家图书馆。据傅先生《藏园群书题记》“此戊寅残腊董授经同年为余得之邃雅宅书肆者”^{[2]卷四,223},共九十卷。《画苑记》缺末卷,后以自己所藏补齐。钤有“如皋李犹龙元德氏”、“畏天畏人心法积书积德名家”、“国立北平图书馆印藏”、“傅沅叔藏书记”等印。墨迹较重,多处被水浸渍,不易辨识,且有多处补刻。其中《郡县古今通释》、《风俗记》、《方物记》、《著作记》、《高僧记》、《诗话记》、《画苑记》有刻工姓名,如“余伍”、“余明忠”、“黄金显”、“何明受”、“毋崇禹”等。从各记的刻工姓名来看,它们应该是由同一批刻工刊刻,但在页面版式上各记却并不一致,因此它们又应该是刻于不同时间的。《名胜记》卷首有钟惺序,《诗话记》卷首有魏说《蜀诗话画苑二录序》。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又谓《方物记》“前有魏说序,序中述其既有蜀《通释》、《风俗》、《诗苑》、《画苑》等录,复成《著作》、《方物》二种”^{[1]卷五,32}。今不见,疑毁失。

2. 天一阁文物保管所存五十四卷:《诗话记》四卷、《著作记》十卷、《神仙记》十卷、《风俗记》四卷、《画苑记》四卷、《方物记》十二卷、《高僧记》十卷。

原为萧山人朱鼎煦“别宥宅”收藏,后捐赠天一阁文物保管所。钤有“朱别宥宅藏记”、“萧山朱鼎煦收藏书籍”、“朱鼎煦”、“别宥”等印。刻印清晰,保存完好,但扉页风化严重,极易破碎。卷首有“广记目录”。其中《神仙记》十卷为它馆所未有,为海内孤本,不但补齐了完整的《蜀中广记》明刻本,更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如卷之三《原化记》所引故事,有四百余字,而四库全书本抄漏,其价值由此可见。另外完整的《方物记》十二卷也可弥补国图的缺憾。其它部分,则完全与国图所藏一致,可见两者系出同源。

3. 北京大学图书馆存二十二卷:《郡县古今通释》四卷、《风俗记》四卷、《宦游记》四卷、《边防记》十卷。

其最值得重视的是《边防记》十卷。从明刻本与

四库本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所有十二记中两者差别最大,因为明刻本中涉及清廷的诸多忌讳,故被四库全书抄录时作了较大改动,因而它的校勘价值也就显得尤为突出。国图所藏只有四卷,其余六卷则赖此保存,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以上三馆外,其他一些图书馆也藏有《蜀中广记》的零星明刻本,只是卷数不多,且与它馆重复,如清华大学图书馆存有《著作记》十卷、《方物记》十二卷。要指出的是《著作记》十卷,宋建隼先生在《曹学佺和他的〈蜀中著作记〉》一文中据傅增湘题跋认为此为海内孤本^[12],实有误。天一阁文物保管所所藏明刻本与此完全相同,故不能称“孤本”,大概他们都没有见到,故有此结论。

从以上各馆的收藏情况看,尽管各馆所藏均有残缺,但如果综合以上各馆所藏,正好构成完整的一百零八卷,这实在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二)四库本《蜀中广记》

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注,四库本底本采自两淮马裕家藏本。不过,在现存《四库采进书目》中只记录有浙江鲍士恭所呈三十八卷,而马裕家呈送书目中并无此书^[13]。为何《四库采进书目》没有记录呢?这大概是马裕后来再次呈送时未作记录。据《扬州画舫录》记载:马裕“恭进藏书,可备采择者七百七十六种”^{[14]卷四,88}。而《四库采进书目》则只记录有六百八十五种,可见其他九十一卷未作记录,而《蜀中广记》应该就是其中之一。从《四库采进书目》来分析,马裕家藏的这个《蜀中广记》极有可能是唯一一部完整本,而且是曹学佺手抄的。如前所论,曹学佺在万历四十二年完成修订整编并重新抄录后,很快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其他著述上,或许是因为全书卷帙浩繁,加之编撰时已刻印了部分,后来也未对全书作刊印。曹学佺殉国后,“田舍书籍皆入官,子孙皆系狱”^[15],这个唯一的手抄本《蜀中广记》虽然入官,但也使其免于兵燹战火,得以完整保存。再后来,辗转易手,它最终为马裕的父亲马曰瑄所得。马曰瑄与其弟马曰璐虽为扬州盐商,但受家族“贾而好儒”的家风影响,雅好文学,文采斐然,尤酷爱典籍,七略百家,二藏九部,无不罗致,积书百厨,十余万卷。阮元《淮海英灵集》云:“(马曰瑄)酷爱典籍,有未见书,必重价购之。世人愿见之书,如朱检讨《经义考》之类,不惜千百金付梓。以故丛书楼所藏书画碑版,甲于江北。”^{[16]乙集卷三,107}甚至对藏书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全祖望在《丛书楼记》中写其

嗜书、购书之情状云:“予南北往还,道出此间,苟有宿留,未尝不借其书,而蠡谷(马曰瑄)相见寒暄之外,必问近来得未见之书几何,其有闻而未得者几何,随予所答,辄记其目,或借钞,或转购,穷年兀兀,不以为疲。其得异书,则必出以示予,席上满斟碧山朱氏银槎,侑以佳果,得予论定一语,即浮白相向。”^{[17]卷十七,618-619}大概马氏兄弟就是凭着这种对藏书的偏嗜,多方访求,不惜重金才得到这部《蜀中广记》。可惜的是,尽管乾隆帝允诺“俟将来办竣后,仍给还各本家自行收藏”^{[14]卷四,88},但四库全书修完之后,藏书的归还却没有了下文,这个唯一完整的明版《蜀中广记》从此失佚。而四库本也就成了唯一的完整本,只不过它经过四库馆臣的删改已非原貌。

与明刻本相比,四库本的特点是它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将相对独立的十二记,以统一的义例编排在一起,颇能体现出全书“广记”的宗旨,这大概也是曹学佺修书的初衷所在。而从两个版本的内容来看,由于《边防记》触及清廷的诸多忌讳,四库本因此作了较多删改,至于其它各记则基本能保持原样。另要注意的是四库本有两处严重抄漏:一处是前面提到的《神仙记》漏抄四百余字;另一处在卷九十五,即《著作记》第五之末,漏范镇《崇道观道藏记》近六百字。这些都可看出四库抄录人员的随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四库本的质量。不过,由于明刻本比较分散,且极不容易看到,因而四库本就成了人们最常用的一个本子,为后人反复影印。如傅增湘先生在南北搜求它本不得而果的情况下,破例以是书列入《四库珍本初集》,于1936年据文渊阁四库全书覆印。再如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及2003年由缪文远主编、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西南史地文献》,都是据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这些都说明四库本在保存《蜀中广记》的完整性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今人研究巴蜀地方文献提供了方便。

(三)其他版本

除了明刻本和四库本,《蜀中广记》还有一些零散单行的本子,如《名胜记》,实际上在林茂之刊刻于南京后,它已独立成书,甚至在影响上都超过其母本《蜀中广记》,因而不断有人翻刻。其他也有单独流传的,如傅增湘先生曾提到他在得到九十一卷明刻本之前,偶见有故宫图书馆《著作记》一种,李椒微家有《郡县古今通释》、《宦游记》、《高僧记》三种。这些单行本也值得今人重视。

参考文献:

- [1]永瑢.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2]傅增湘. 藏园群书题记[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3]曹学佺. 大明一统名胜志[G]//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67册. 济南:齐鲁书社,1996.
- [4]曹学佺. 石仓诗稿[M]. 清乾隆二十九年曹岱华刻本.
- [5]曹学佺. 曹学佺集[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
- [6]徐焯. 曹能始石仓集序//红雨楼序跋[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 [7]魏说. 蜀诗话画苑二录序[M]//蜀中广记. 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
- [8]钟惺. 蜀中名胜记序[M]//蜀中广记. 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
- [9]曹学佺. 蜀中名胜记[M]. 刘知渐点校.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
- [10]刘孔伏. 《蜀中广记》成书年代考辨[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2).
- [11]傅增湘. 藏园群书经眼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2]宋建昆. 曹学佺和他的《蜀中著作记》[J]. 四川图书馆学报,2000,(6).
- [13]吴慰祖. 四库采进书目校订[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 [14]李斗. 扬州画舫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 [15]徐延寿. 大宗伯曹能始先生挽章//尺木堂集[M]. 厦门大学图书馆藏手抄本.
- [16]阮元. 淮海英灵集[G]//续修四库全书:1682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17]全祖望. 鲒埼亭集外编[G]//续修四库全书:1429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On *Shu Zhong Guang Ji* by CAO Xue-quan and Its Versions

YAN Zheng-dao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Arts,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9, China)

Abstract: *Shu Zhong Guang Ji* by CAO Xue-quan is an important local document. It was first compiled during CAO's tenure in Sichuan Province, further improved in CAO's hometown after his being recalled and finally completed in 1614. However, CAO did not publish every chapter of the whole book so that the later collectors have to collect his part with other publishers' parts which formed the incomplete version of Ming copy. CAO's original manuscript was kept by MA Yue-guan brothers. When *the Si Ku Quan Shu* was being revised, the manuscript was presented by MA Yu and that is the only complete version of *Shu Zhong Guang Ji*.

Key words: CAO Xue-quan; *Shu Zhong Guang Ji*; the time of completion; versions

[责任编辑:唐 普]